

留给纯爱战士的时间不多了

李元

“我就坐在这里读他写的东西，边读边掉眼泪。”一个在巴金故居工作过的员工说。她指的是巴金写的《怀念萧珊》。一个女人，坐在一个男人曾经生活过的房子里，读这个男人写的文字，然后默默流泪。这样的相遇，像故事企图继续被人讲述。尽管巴金也说过，如果作家通过社会新闻同读者见面，而不是通过作品，那人家疑心你做出稀奇古怪的事也不为过。但是，人们总会情不自禁地窥探起他人的私人生活，更何况是一个作家的。

《怀念萧珊》的第一句话是，“今天是萧珊逝世的六周年纪念日”。第二句是“六年前的光景还非常鲜明地出现在我的眼前”。这样的句子如果不是出现在这篇散文里，还会出现在哪里？大概是在言情剧或者偶像剧里；消失了十多年的男人出现了，他对女人说，其实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有忘记你，你的脸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这样的台词总能赢得一些观众的心，像舒适的精神按摩，帮他们排解曾受过的伤害。渐渐地，我对能让人不费力就获得愉悦的作品充满警惕。当然这是口味和需求的问题，我的喜好无关紧要。有的人需要真相，有的人只需要一场荷尔蒙大雨。况且现在的编剧们也与时俱进了，深情人设朝着更贴近现实生活的人物肖像过渡。一个刚开播的韩剧中，女主角被设定成34岁未婚女性，男主角是她的青梅竹马，如今已是年轻有为的建筑师。总之，任何年龄段都逃不了造梦这遭坎。

以上的这些想法纯粹出于我在读到起始这两句深情话语时感到的困惑，说回《怀念萧珊》。这是一篇散文，散文不是杜撰的，写的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参加文学工作坊时我提过关于散文写作的问题：小说家可以安全地藏在故事后面，隐姓埋名，既然散文是真实发生的事情，那岂不是需要很大的勇气才能够将自己的生活公之于众？

我收到的其中一个答案是这么说的：有选择地去写。

我想看看巴金是如何做选择的。他从六年之前说起，“四人都”将他搞得很狼狈，让他成了“罪人”，被叫出去“示众”。萧珊作为他的妻子被连累，被关进“牛棚”，挂上“牛鬼蛇神”的小纸

牌，还要扫马路，甚至挨了打。他们每晚临睡前都要服两粒安眠药才能入睡，相互诉苦，“日子难过啊！”这时期里，萧珊患了病，巴金想尽办法，最后终于靠开后门才住进医院。那天卫生防疫站在他们家消毒，他收到消息说妻子快不行了，他赶去医院，发现妻子病床上的床垫已经被拿走了。太平间里，拍着还有点人形的白布包，他哭着唤她的名字。但医院也只给了他几分钟的时间。

其实巴金说的没有错，读者应该通过作品，而非个人私事才被公众知晓。换句话说，阅读一个作家的回忆录，是没办法真正理解他的文学作品的，这两者之间并不互通，反而会误导读者以生活化的通俗的层面去理解。这篇《怀念萧珊》是以第一人称视角来写的，出现最多的却是“她”。巴金通过写作这篇回忆录试图获得心灵的慰藉和救赎，除此之外，我看不出他有任何文学上的企图。他对自己个人的叙述，寥寥几笔仅局限在自己被批判和看到萧珊受苦时的心情上。剩下的全都是：

“她不想死，她要活”；“她不仅分担了我的痛苦，还给了我不少的安慰和鼓励”；“人们的白眼，人们的冷嘲热骂蚕食着我的身心”；“她自己还很高兴，以为得救了”；“她回答：你陪我就好”；“从她那双含泪的眼睛里我明白她多么想看见她最爱的儿子。但是她已经没有精力多想了”；“她每天输血，打盐水针”；“她非常安静，但并未昏睡，始终睁大两只眼睛。眼睛很大，很美，很亮”……

巴金清楚地知道妻子不仅仅是一位家庭妇

女。她说她有才华，却缺乏刻苦钻研精神，他说他喜欢看她翻译的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小说，虽然翻译得不恰当，但却是创造性的文学作品。我也做过翻译，曾经因为一个词语或者一段文字到底应该怎么翻，和编辑来来回回地讨论，邮件发了几十封，还没争出个对错，乃至找了更多的专家来解释原文中的意象。而巴金，他偏爱萧珊不恰当的翻译，他觉得这是创造性的文学。

他还写到萧珊的葬礼，没多少人来参加，他在变了形的妻子的遗体旁边站了一会，别人给他和她照了相。他想：这是最后一次了，即使给我们留下来很难看的形象，我也要珍视这个镜头。最后，巴金写了一句令我感到陌生且魔幻的句子：“等到我永远闭上眼睛，就让你的骨灰同我的掺和在一起。”

我忽然意识到，如果你想知道一个人是否真的在乎你，就去听听他如何描述你的。不是描述他和你在一起时的感受，不是描述他曾为你做过的努力，不是描述他期待和你一起构建的美好未来，不如让他来描述一下你。对，就是你。韩炳哲提到，整个世界只是“自我”的一个倒影。他者身上的差异性无法被感知和认可。然而，爱欲的前提是作为他者的非对称性和外部性。也就是说，爱情的重要条件是一个人在“他者”面前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承认对方是难以被纳入任何类别。我像在做阅读分析一样地阅读这篇《怀念萧珊》，惊叹于每句话背后潜藏的忘我。现代人面对分手，会无法克制住冲动洋洋洒洒地给昔日伴侣写小作文，摁下发送键的那一刻忐忑又激

动，感觉自己完成了一件壮举。但如果他们能读一读巴金的这篇回忆录，他们或许会明白为什么他们发送出去的那些小作文，永远都得不到回应。

《随想录》里，巴金还写了一篇题为“结婚”的小短篇，只有一页纸，大概意思就是，他否认了自己再婚的消息。他写，“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种事”。

我不禁好奇，一段关系终结，一个人离开了你，那就换掉，换一个新人，让生活重新焕发生机，这真的可能吗？这当然可能，我在现实中见到不止一个嫫夫速速为自己寻找到一拍即合的下一春，马不停蹄地结婚，悄无声息地安居乐业。中老年人爱情，真的不会浪费一分一秒。被誉为爱情圣经的电视剧《欲望都市》，讲四个女人在充满诱惑的纽约寻找着真爱。自1998年起开拍到2006年第6季落下帷幕，但观众们不肯罢休，还想着，于是制作人继续制作，《欲望都市》电影版也跟着拍了两部，没过多久HBO又将这个剧复活了，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就这样……”，当然了，这么多年过去，剧中的四位主角也纷纷步入中年。第一集里，和女主角凯莉纠缠了大半辈子的纽约金融大鳄，意外死了。凯莉失去了一生挚爱，她拿着巨额遗产，整天魂不守舍。她不知道应该如何接受爱人的离世，她舍不得搞掉婚戒，她搬出了他们曾共同居住的豪宅，但是悲伤依然涌上心头，生活陷入一片黑暗。我不知道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一个人应该如何科学地渡过爱人离世的这一阶段，并慢慢接受现实。但在电视剧里，编剧让凯莉拿出手机，注册了约会软件，重新开始约会。

毕竟，谁会想看一个中年女人怀念亡夫的故事呢？

让女主角重回约会战场，重复过去几十年里她曾经经历过的热情和刺激，观众无论出于怀旧抑或好奇，总还是会上瘾的，但这么做也将对于爱的诸多可能性局限住了。仿佛把精力用在缅怀，而不是寻觅下一段关系的话，将会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

《怀念萧珊》的第四小章里，巴金回忆起他们相识的情景，1936年他们第一次在上海相遇，1944年在贵阳结婚。抗日战争紧张的时期，他们在日军攻城前逃离广州，开启了逃亡之路。这期间他们分散，又重逢，相见后又别离。他把那种颠沛流离的生活记录了下来，起名“旅途通讯”。他又将《旅途通讯》加入了《文集》，却遭朋友的批评，朋友质问巴金：“这算什么文章！”他的这个朋友一定认为爱情只是生活的锦上添花，是餐后甜点。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会看不起作品中的感情呢？几年前我遇到一位出版社社长，他问我喜欢哪个作家。我不假思索地说，弗朗索瓦兹·萨冈。她离经叛道，又如此神秘，读她的小说，仿佛能看到她那不留情面的微笑。那社长轻蔑一笑，

说：“哦……萨冈啊，她是写轻小说的，情情爱爱那些东西。”难道一定得是奈保尔、菲利普·罗斯、J.M. 库切……这样的作家写的才算严肃文学吗？在一场关于意大利文学的对话中，有人问戴锦华：费兰特写的“那不勒斯四部曲”算不算史诗？戴锦华回答：“四部曲”是反史诗的，因为史诗是一种文体，这种文体决定了史诗是关于最基本的父权文化的那些事情。这些最朴素的女性立场曾经不能进入，而现在不屑于进入。当然，这也是题外话，从古至今受到如此待遇的作家们可不在少数。

听到了朋友的态度，巴金决定不让《文集》重版，但是他为了自己，会经常翻看《旅途通讯》。他不允许自己忘记落入苦难境地时，是萧珊不断地告诉他，“不要难过，我不会离开你，我在你身边”，萧珊唯一一次对他说了分别，“我们要分别了”，那是在她最后一次进手术室之前。

当生活被戏谑浸透，爱情面临新的挑战，现实主义、实用主义、道德标准……忘记往日的美好时光成了一种必须熟练掌握的生存技能。当然可以总结为——现在的社会情况比以前更加复杂。保护自我的警醒已然超越了坠入爱河，“自我”的倒影从水面中立起来，这个庞然大物的目光所及里却看不见任何独立的“他者”。爱依然蔓延在生活里，但被切分成很薄很薄的一小份，运气好的话，你能分到一小块。

在亲密关系中吃了苦的人，在一声声喇叭声中把头埋进自己的臂弯里，他们不理解为什么有的人可以同时爱上很多个人，也不理解那些人为什么不在一段关系中发现自我，却选择坚持自我呢？他们困惑地体验着令人痛苦又令人害怕的爱，他们好奇地问那些轻松走在爱情游戏里的聪明人，到底要怎样才能和你们一样情绪稳定地面对捉摸不透的爱呢？聪明人回答：坠入爱河固然美好，但谁能保证自己这一生就一定遇见真爱呢？

所以，当我读到《怀念萧珊》这样的文字，我的第一反应是，真的吗？真的有这样的感情吗？他们是怎么做到的？谁能来教教我？

这些问题能在文学中找到成千上万种解释，然而科学家早已发布过精准的研究成果。爱情的驱动力来源于激素、多巴胺、催产素以及血管升压素。它们掌管不同的大脑功能，每一项都精准地定位到具体的感官。无论你认为这是一场多么轰轰烈烈的爱情，科学都会告诉你，那是因为多巴胺。这样清醒理智地解开爱情的面纱，真让人绝望。

但转念一想，科学可以解释爱情爆发和消亡的瞬间，但没办法解释，为什么在妻子去世6年后，巴金依然可以饱含深情地写下这样的回忆。他清晰地记得一些细节，当时彼此的样貌，具体的时间，她的才华，她的苦难，她的不舍，还有他们在睡前一起吃下的安眠药。

图为正在加紧建设中的上海文学馆（虹口区武进路439号）。馆内首设的巴金图书馆将于今年11月25日（巴金诞辰120周年）向公众开放。 叶辰亮 摄



“牵系我的心的便是那无数的年青的心灵”

——巴金书话两题

韦 泱

从《点滴》到《点滴》

十五年前的二〇〇九年，忽然收到一份叫做“点滴”的刊物，小三十二开，赭红色封面，书法体刊名，十分亮眼。这是由巴金故居和巴金研究会主办、上海市作家协会主管的内刊。这“点滴”两字，是从巴金手迹中辑集而来。此刊没有“创刊辞”之类的文字，刊物后面有一则《〈点滴〉稿约》，第一句即是：“想给读书人提供一个信息交流的平台和畅所欲言的园地”；还说：“不发表长篇大论，文章以短小精悍、言之有物为上。内容与巴金及其著作有关，但也不限于此，中国现代文学的人和事都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书评书话、读书札记、忆人论事、行旅所见等等都欢迎，惟求文章有点史料有点故事有点趣味；要朴素，不要流俗、滥调，更不要庸俗；那些大刊物上不发的东西，只要有真实性，我们同样欢迎”。这非常鲜明地表明了刊物的立场和观点。打开目录页，栏目“还魂草”“梦与醉”“憩园”等，都是巴金旧著的书名。我明白了，从刊名到栏目，都与巴金相关呐！于是，我找出斋藏中的巴金《点滴》，细细读吧。

《点滴》是巴金的一部散文集，前有巴金作的《序》，一口气读完，我惊喜地自问自答：序还能写成这样的呀！文中写道：“我编好这个集子，就这样平淡地结束了我这三个月来的平淡生活。”如果没有这样一行字，真看不出这是一本书的序言。《序》文的第一句说：“在一个城市里住了三个月，现在要搬到另一个更热闹的城市去了。不凑巧搬家的前一天落起雨来。”第二段从“一落雨，就显得凄凉了”写起，写到作者的居所，居所周边的环境，以及“因这风雨而起心的寂寞”，作者以写出这十几篇短文的方法，排遣了寂寞。最后仍以雨收尾：“一阵狂风在屋后的小茶树和松林间怒吼，雨不住地像珠子一般落在屋顶上。”巴金写这篇序文，可谓序无法定法，只求真实达意。

这篇《序》中，巴金提到的“三个月来的平淡生活”，究竟是怎样一种生活状况呢？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下旬，巴金离开上海赴日游学，住在横浜高等商业学校执教汉语的副教授武田雄家里。武田是吴朗西为巴金介绍的日本朋友，家住横浜本牧町的一处小山坡上，巴金在文中写道：“我住在僻静的山上，跟热闹的街市和码头

都离得很远。打开正面的窗望出去，望得见海。”《序》的写作时间是“一九三五年二月在日本横滨”，也即巴金住在横滨的最后一个晚上，第二天他就要去东京了。他在横滨寂寞和平淡的日子里，编了这本《点滴》。共收二十一篇文章，其中十六篇写于横滨。五篇原在国内已写就，并随身带到日本去的。书编定就寄回国内，由开明书店出版于一九三五年四月。其时，巴金已住在东京中华青年会旅舍里。在此，他写下了短篇小说《神》《鬼》《人》（后合成一集《神·鬼·人》），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童话《长生塔》（一九三七年三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由于薄仪要访问东京，日本紧急查处华人，巴金就被警察搜查审讯，并关押了十四个小时。那很小的牢房，要关进八个人，连脚也放不下，而且臭气熏天难以忍受。所幸警察没有发现什么疑点，也没有发觉巴金用的是化名，得以释放。但这件事极大伤害了巴金的人格和自尊，使他学习日文的兴趣荡然无存，遂于八月就回到国内。巴金后来在给编辑王仲晨的信中谈及此事：“收在《点滴》中的文章，绝大多数是在日本写的，那个时候中国人在日本经常受歧视，我感到不痛快，拿起笔就有气。”那是一个中国人处处受欺辱的年代，不仅在日本，也在世界其他国家。当然，巴金是日本人民喜爱的作家，与多位日本作家结下深厚友情，还在一九九〇年获得日本福冈亚洲文化特别奖。

巴金致王仰晨的信，已说明了在日本十个月的游学活动及《点滴》的写作背景。书为何取名“点滴”，巴金说：“这本小书是我三个月来的一点一滴的血。血这样流出，是被贱卖了。这些文章和明朝人的作品不同，句句是一个活着的现代青年的话，所以我喜欢它们。”在《月夜》里，巴金这样描写横滨的夜景：“在清朗的月夜里，海横在天边就像一根光亮的白带，或者像一片发亮的浅色云彩。初看，绝不会想到是海。然而这时的海却是美丽的。”《支那语》中，巴金批判了日本几个号称中国语权威的人，在编纂汉语教科书中，充斥前清时期的旧词。《书》则批评了北平图书馆的衙门作风等等。这些散文，如同杂文那样犀利，表现出巴金揭露黑暗和丑恶的社会现状的勇气。

一般来说，人们总是把巴金称作小说家、翻译家，却不太说散文家。其实，他的散文写作早

于小说，五十年代巴金在《谈我的散文》一文中说：“三十年来我一共出版了二十本散文集，我的第一本散文集《海行杂记》还是在我写第一部小说之前写的。”正如文艺评论家陈丹晨先生所说：“巴金习惯用清新、平易、自然的文字描绘出真实的清丽的画面，保持了他的朴素、流畅而富有热情的风格。”他的散文集《点滴》，正是这样风格的鲜明体现。

从巴金的散文集《点滴》，再回到当下的读书刊物《点滴》，可以说，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十五年办刊，殊为不易。不但办期刊，还向读者推出“点滴”文丛多种。《点滴》秉承巴金“说真话，把心交给读者”的文学理想，刊出许多关于巴金、关于现代文学的佳文。不少读书人热爱这份读书刊物，愿它办得更受读者欢迎。这也是我作为刊物的读者，也是刊物作者的良好心愿。

《感想》的分量

除了大部头的全集、文集或选集，巴金一生出版过许多单行本。《感想》可能是其中最不起眼的一本小册子了，只有薄薄的四十五个页码，这在巴金出版的著作中，属于最薄的一种了吧。然而，我捧在手上，却感到沉甸甸的。

《感想》收十篇散文，大多是短短的，有人称之为杂谈。因为那是在抗战的特殊年月，正如巴金在《前记》中所写：“收在这小册里的短文是一些感想和杂感。它们算不得正式的文章，不过我在那里说的全是真话。而且我以为我们在这个时候应该说真话。”

且看书中的第一篇散文《感想（一）》——在“孤岛”，作者写道：“一个十七岁的孩子远迢迢地从天津写信来说：‘先生，你也是陷在同样的命运里了，我愿意知道你的安全。’短短的两句话中含有无限的沉痛。我固然感激她的关怀，但是我更惭愧我没有力量去安慰她那渴望着温暖的年青的心。我没有权利叫人为我的安全耽心。十七岁的天津孩子的信里的话语，就飘进了我的心头。我苦痛地想，难道我真的不能把这身子化作火柴燃烧起来，给那些年青的心灵添一点温暖么？我自己太没有力量了。然而生活在患难中的中国的青年，是不应该依然悲观的。即使那应得的安慰和鼓舞不会来，即使没有人来领导他们，他们也必须在苦难中坚持下去，用患难把自己的脆弱锻炼为坚强，培养自

己的力量，准备迎接那黎明的将来。”

巴金的话，字字扎心，句句有力。这篇文章就是因巴金收到一位十七岁的女儿的信而发出的感慨。文中，巴金没有透露这个女儿的姓名。但是我知道，她就是女翻译家杨苡先生。在南京她的寓所，我多次去看望过她，与她聊过巴金。后来，我写了她与巴金交往的文章。在巴金的朋友中，她那时是年龄最大的一位健在者，已逾百岁。巴金写此文，就是要鼓励她这样的青年，在危难时刻，要坚强起来。同时，巴金发出了自己心中的呐喊：“牵系我的心的便是那无数的年青的心灵，所以读到天津的来信，我竟然淌了眼泪。但是我绝不是不是一个失败主义者，我也不是悲观派。真正相信着最后胜利的极少数人中间，我应该算是一个。我至今还向朋友们发表我的乐观的论调。”这就是巴金，既安慰青年，也不忘自励。

巴金在《前记》第二段文字中还说：“我自己十分喜欢那一篇题作《给一个敬爱的友人》的文章，这是怀着热烈的希望写成的，我写最后一句话时，敌机就在我的头顶上投弹，但是我终于把它写完了。我对于抗战的最后胜利的坚定的信念，读者可以在这篇文章里看出来。”

因为巴金的推荐，我在书中特别注意此文，它的篇幅稍长，是压轴的文章。它以书信的形式写成，既亲切又诚挚，如同与好友促膝谈心，情意真切。巴金的信，是写给一个日本朋友的。从抗战中的中华民众受到的灾难，联想到日本民众同样受到过的战争伤害。最后写道：“先生，这时候我并没有惧怕。我的信念使我的心镇定。我居然写完了这样一封信。我愿意它能够飞越海到彼岸，把我的这心情传递给你。我不仅把你看作一个敬爱的友人而诉于你，我还把你视为曾经作过劳动运动的领导者的同志而诉于你。我等候着你们的回答，你们会用行动来回答我，我这样相信着。”

巴金在文中提到的这位“先生”，就是日本作家石川三四郎（1876—1956），他毕业于东京法学院，是日本社会活动家，笔名“旭山”，出版过《西洋社会运动史》。一九三四年，巴金化名“黎德瑞”，经吴朗西介绍赴日留学，乘日本豪华客轮“浅间丸”二等舱，到日本横滨市，几个月后转到东京，曾到郊外石川三四郎的寓所看望过他。两人一直保持友谊。巴金翻译过他的《春月之死》《忆春月》，两文均编入《巴金译文全

集》第五卷。

《给一个敬爱的友人》初刊茅盾和巴金主编的《烽火》第十六期，共连载三期，后编入《感想》一书。一九三七年抗战中，原《文学》《文丛》《中流》《译文》合并成战时联合刊物《呐喊》，出版两期后，改为《烽火》。从第二年十三期起，因战事紧迫，转移到广州继续出版，由烽火社发行。在第二十二期后面，有一则《敬告读者》：“广州常遭敌机轰炸，印刷工作不时停顿，本刊未能按期出版，敬祈读者原宥。”这期成了终刊号，原因已经说明。

在出刊《烽火》月刊的同时，烽火社出版了“烽火小丛书”，其中有巴金《控诉》（第一种），靳以《我们的血》（第二种），王统照《横吹集》（第三种），郁振帆《在天门》（第四种），骆宾基《大上海的一日》（第五种），茅盾《炮火的洗礼》（第六种）等，钱君匋《战地行脚》（第七种）。巴金的《感想》列为第八种，于民国二十八年七月由烽火社出版，桂林文化生活社总代售。封面上的书名“感想”套红印刷，十分醒目，中间是一幅钢笔速写，空荒的田野，被铁丝网分割着，上面盘旋着敌机。画面笼罩着一派战争的恐怖气氛。这就是战时出版的读物，简洁而明晰。此书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与巴金的其他几部抗战内容的书一起，编入《控诉集》，作为“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一种。

《感想》这本小册子，只有三四万字，我却读了很长时间。从中我触摸到一位正直作家的真诚之心，他血气方刚，他忧国忧民，他的大爱大恨，他的鲜明立场。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家，就必须怀有这样的胸襟，就必须具备敏锐的思维。

《随想》的封底，有一上海旧书店的销售章，印着“售价0.20”字样。这大概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旧书定价，现在即使花两百大洋，涨一千倍也买不到吧，可它是无价之宝！



「文汇报」
微信公众号